

新造中华资格之巾帼

——晚清“女中华”的话语构建与女性想象

马 龙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在晚清,对于女性的热情关注与想望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知识界提出的“女中华”命题尤具典型意义。此说首见于上海《选报》的一则报道,后经金天翮在《女界钟》一书的引述,以及《女子世界》杂志举办的主题征文活动而获得关注。因为话语形式本身的开放性,所以在启蒙者言说与文学书写中存在着微妙差异,由此形成独具意义的张力空间。聚焦于“女中华”这一独特的社会性别符号,梳理它从产生到传播的具体过程,讨论晚清知识界如何借此参与女性的想象与再构,并力图揭示其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深刻关联。

关键词:晚清;女中华;《女子世界》;女性想象;民族国家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2)06-0073-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20608

在晚清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知识界对于女性的热情关注与想望构成醒目的社会文化思潮。然而,“女性”在诉诸相关启蒙人士的笔端时,始终伴随、萦绕着一个同质的价值判断,即女性限于身体、知识和生存能力的缺陷,既不能以劳动者的身份直接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经济价值,又不具备为国家生产合格国民的母亲资格^[1]。更严重的地方在于,作为一种与男性相对的性别实存,女性除了被赋予一种“贬抑”的价值判断之外,又要经常被当作一种衰朽、病态的前现代状态的象征符码来使用^{[2][23]}。例如,梁启超曾经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传统文化,认定为一种“女性”特质的文化:“务使一国之人,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呜呼!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者乃至有鬼道而无人道。”^{[3][41]}国人孱弱萎靡的精神特质被类比于女性的纤顺温柔,而“女德”与“病者”“暮气”“鬼道”这些明显包含贬义色彩的语汇相嫁接,且以之对比于“健者”“朝气”“人道”等阳气十足的“男性”词汇,梁氏略带性别歧视色彩的论述逻辑,不仅仅阐明了女性身处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不利位置,更明显规定着这一性别主体于超越自身之外获得的符码性意义。既然女性因其肉身缺陷,成为阻碍国家进步、社会发展的“原罪”,甚至是作为“衰朽”“病态”的象征性符码以及古老中国的政治隐喻而为有识之士所诟病,那么在“新”女性与“新”中国之间建立起联系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正如金天翮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所论:“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4]这代表了晚清知识界的普遍呼声。曾经在晚清红极一时的“女中华”命题,即可以在上述背景下加以讨论。而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女中华”的学术接受史进行一番回顾。

纵观学界关于“女中华”的既往研究,不仅成果稀少,而且多有不足:李奇志的专著《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中的“英雌”话语》曾指认“女中华”为清末民初英雌话语构建的最小单位,但可惜的是,本书主要

收稿日期:2022-10-17

作者简介:马龙(1995—),男,山东新泰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国文学与性别研究。

立足于晚清“英雄”思潮的宏观把握,对于“女中华”话语本身几无着墨;夏晓虹的专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在《历史记忆的重构——晚清“男降女不降”释义》一章对“女中华”一说有所涉及,主要谈到它的出现与传播,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书写等等,但这些针对“女中华”的简单言说,只是作为阐释“男降女不降”主题的附庸或证据而存在,“女中华”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的价值无从凸显,并且一些更加细微的问题尚未得到揭示,比如《女子世界》杂志为何要将“女中华”列为征文的首题,几篇征文又是如何借“女中华”之名对女性进行具体的想象与再构。尽管如此,上述相关研究仍然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有力支持,本文也正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持续开掘与深化。

一、再造女性:“女中华”话语的提出与男性启蒙者的建构

“女中华”一说起于何时?按照目前已知的研究,学界基本认定其最早出现于1902年《选报》的一则报道。《选报》于1901年在上海创刊,由蒋智由(观云)、赵祖德(彝初)所倡办,刊物以“开民智”为主旨,下设“论说、谕旨、内政纪事、外交纪事、地球各国纪事、所闻录、他言集、筹远集、工产志略、文学小史、经济备览、倚楼杂录、剧谈录、国风集”等栏目,选登国内外各报所载重要消息和言论并附以论说批评,而在1902年第31期的“文学小史”栏目,有一则《志女中华》报道,讲述一位署名“裙钗真仆”的广东志士,伤感于中国前途,怜悯于女性命运,因此特意写作《女中华》一书以唤醒女魂、打破夫纲。此书不日即将问世,报道者特摘录此书的部分自序以飨读者,只见序中有言:“今中华之男子皆须眉而巾幗矣,中华巾幗且耻须眉而不为乎?吾知今后中华非须眉之中华,而巾幗之中华也。中华舍二百兆之巾幗,其谁归乎?吾爱须眉,吾尤爱新造中华资格之巾幗。”^[5]通过对自序部分的摘录,可见“女中华”在原文语境中的实际意涵为“具备新造中华资格的女性”。可惜的是,虽然序言中表现出对男子的揶揄和鄙薄、以及对女子的殷切期望很容易体察,但“具备新造中华资格的女性”这一说法毕竟太过笼统,论者更未及言明这一新造中华的重要资格,对于女性而言究竟要如何获得。也许,正是这一话语在出现之初即遗留一定缝隙,才使得后来者金天翮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增添意义。

“女中华”一说在1902年的首次出现并未引起波澜或回应,直至下年(1903年)金天翮在著名的《女界钟》一书中对此加以引述,才使得此说流布稍广。作为晚清女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女界钟》除小引、绪论和结论外,分述道德、品性、能力、教育、权利、参政、婚姻等七个与女性切身相关的议题,其中犹以教育为最大关切,使其贯穿于全书。特别是在《女子教育之方法》一节,作者金天翮将上述报道中提及的自序部分全文引入的同时,更要借题发挥,为晚清女学张目:“夫巾幗而欲含有新造中华之资格,舍教育其仍无由。”^{[6]39}在金氏看来,女性若要具备“新造中华”之资格,接受教育实乃不可缺少的一环。换句话说,女性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担负起创造新中华的历史重任,成为合格的“女中华”。女子教育本为晚清有识之士思索社会变革的关键条目,此乃因本议题确实与国家之强弱息息相关。1895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以西方为借镜,率先建构起教育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7]909}他的弟子梁启超随后延续师说,但将笔触更具体地聚焦于女学:“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是故女学最胜者,其国最强……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8]41-43}相较于康梁师徒之论,金氏的表述亦以女子教育为紧要,不同点在于其以“女中华”代替“民族国家”,以一种相对具体、切实的说法置换宏大的民族主义政治修辞(虽然“女中华”话语背后仍含有“女性为新造中华服务”的政治动机,三人论述的深层思想逻辑其实高度一致),考虑到金天翮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曾有创办女校的亲身经历,那么在此将女子教育与“女中华”命题相勾连,并以前者为实现后者的先决因素自是情理中事。

不妨稍作引申,对金氏在《女界钟》一书中针对“女子教育”所提的举措略加梳理,从中可知“女中华”在其人心中更细微的面向。首先,在教育内容上,相较于传统闺秀主要接受儒家典籍的“德性”培养与传统诗词歌赋的“艺术”熏陶,金氏设想的女学课程已有较大改变:“故吾宁以经济、法律、哲学导其理想,而以理化、测绘致诸实行。若夫伦理者,实含有家政者也。历史、地理、算学者,普通之必要也。心理者,备教育之用也。”^{[6]41} 此处的科目规划显然对西方的教育模式有所吸取,“经济”“法律”“哲学”“理化”“测绘”“家政”“心理”诸课程轮番上阵,有助于晚清女性“解放头脑”“学以致用”,在具备必需的实用知识技能、发展女性劳动生产力的同时,又能更新其原有的知识结构,拓展其知识视域,促使这一性别群体尽早实现知识体系的现代更替。其次,在教育方式上,传统闺秀或承教于父母长辈,或接受私塾教育、与同族同性同龄之人相与交流,但金氏独具“新学”之眼,特别看重女子游学,尤以“游学欧美”为女学的最高理想。在他看来,中国女子长期遭受“缠足”“装饰”“迷信”“拘束”等外界障碍,只有游学欧美,方能从此类腐朽的社会风气中跳脱出来,况且欧美女子教育“科学深邃、思想发达、人格尊贵”^{[6]38},理应为中国女子教育之表率。至于学成归来,女子的就业前景可谓光明:“彼中之政党、国会、医业、辩护、新闻记者,我同胞其择之可也。”^{[6]23} 借由对“女子教育”的精心发挥,金氏填补了“女中华”在初始语境下的某些空白,将其建构为一种区别于传统闺秀的、具备现代知识谱系的“女学生”主体身份话语。

值得关注的,在于,如果说在“女中华”一说刚出现之时,论者的关注点仅仅在于“中华”这一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符号,女性不过是为完成“新造中华”这一政治任务而被选择的附庸性工具,但到了金天翮这里,由于这位热心女权的革命志士对“女子教育”的充分强调,以及在《女界钟》一书中为晚清女学所设计的一系列精心的路径规划,那么所谓的“女中华”命题已悄然实现了由“再造中华”到“再造女性”的重心转移。这种转移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在“创造新中华”这一终极意义上的政治指归尚未实现以前,势必要先对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主体——女性进行“再造”,而教育恰为制造“新”女性提供了良方,所以在金氏那里,“女中华”的第一要义正是“受(新式)教育”之女。

二、身先士卒:《女子世界》与“女中华”主题征文活动

继金天翮在1903年刊印的《女界钟》一书中对“女中华”之说加以引述,并赋予其具体的意涵之后,1904年创办的《女子世界》杂志,亦对此说表现出浓厚兴趣。创刊于上海、以“倡女权、兴女学”为主旨的《女子世界》,由丁初我和金天翮共同倡办,下设“图画”“论说”“译林”“史传”“小说”“女学文丛”等固定栏目,皆以女性问题为关怀。这里关注的是在杂志首期,广告处刊载醒目的《女学悬赏征文》启事,其中指定两大题目——“女中华”与“急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而以前者为起头,足见刊物同人对此说重视程度之高。在“女中华”命题之下,编者还特意标注:“不拘论说、白话、传奇体例。”^[9] 这一方面说明杂志社同人采稿的广泛灵活,另一方面又间接反映了“女中华”话语确实存在一定的开放性空间,论者可以借助各种文体来加以表述和发挥。值得追问的是,《女子世界》杂志为何对“女中华”之说青眼有加,将其列入征文题目之首?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 杂志灵魂人物——金天翮的积极参与或献言

作为《女子世界》杂志的发起人之一,金天翮在该刊享有独一无二的特别优待,堪称其中的灵魂人物^{[10]92}。先前在撰写《女界钟》一书时,金氏早已对“女中华”之说有所引述,加之与《女学悬赏征文》同期刊布的金氏所作《女学生入学歌》,其中再次使用了“女中华”的说法——“天仪地球万国图,一日三摩挲。理化更兼博物科,唱歌音韵和。女儿花发文明多,新世界,女中华”^[11],由此可见此说已深植其人脑际,《征文》启事之所以将“女中华”列为第一要题,当有金氏的积极参与或献言,确无疑问。

(二) 与《女子世界》办刊理念的契合

“女中华”之说在原文语境中提供的对于女性价值的重新认定,恰如其分地契合了《女子世界》的办

刊理念。回溯那则关于“女中华”的源起报道,心怀理想的广东志士希望将创造新中华的任务交托给女性,视这一性别群体为再造中华的主力军,甚至由此预言一个以女子为领携的未来中华。两年以后,《女子世界》杂志创刊,两位发起人——丁初我和金天翮同样将最热情的歌颂之音献给女性,不仅精心构想了刊物的名称,更在创刊号上直接发表文章,热情迎接一个崭新的“女子世界”的到来——“吾爱今世界,吾尤爱尤惜今二十世纪如花似锦之女子世界,女子世界,自今日始。”^[12]“谓二十世纪中国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何不可?”^[4]“女中华”与“女子世界”背后实则蕴含着晚清启蒙者们相同的价值期待——女性摆脱自古以来位居“第二性”的附庸位置,一跃而成为时代的主角。

(三)“男降女不降”言说潮流的加持

“女中华”话语在《女子世界》杂志的有意彰显,还得益于此时期知识界形成的关于“男降女不降”的言说热潮。可以注意到,在“女中华”出现的原始语境中,署名“裙钗真仆”的广东志士之所以要将再造中华的重担交付给女性,建立在“中华巾帼且耻须眉而不为乎”这样的基础上,其中包含着创作者“尊女抑男”的基本价值评判。这种价值评判,在1903年以后,伴随文人知识群体对“男降女不降”此一历史记忆的反复申说而得到空前强化。“男降女不降”,又称“男投女不投”,根据蔡元培的说法,“所谓‘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者,吾自幼均习闻之”^[13]¹⁷²,可以判断其为长期流传民间的俗语传说,背后讲述的实际是明末清初的一段基本史实,即“满人入关建立清朝政权,要求男子髡发易服、女子放足易服以表投诚,前者得到顺利推行,而后者一直未能实现”。晚清正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明季女子“不放足不易服”的上述行为,被部分有志之士赋予了“不被异族征服”的象征性含义,将其提升至坚持民族大节的高度,并由此产生了“男不如女”的全新价值表述,正如清末知名报人孙玉声在《退醒庐笔记》中所说的:“男投女不投,男穿胡服女仍汉装,男不如女,可耻尤甚。”^[14]⁵⁷晚清志士对此多有感怀的同时,更借此段史事来凸显、赞美中华女子,贬斥、控诉中华男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柳亚子,他先后在《女子世界》发表《女雄谈屑》《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等文章,颂扬明季以来拒绝投降满清的义烈女子,更于言辞激烈处直指中华男子的无能,期盼中华女子崛起:“神州陆沉,迄今二百六十一载矣。须眉男子,低首伪廷者,何只千万……自今以后,二万万女同胞,更有缙‘男降女不降’之遗绪,而同心协力,共捣黄龙者乎?中国万岁!女界万岁!”^[15]除柳亚子以外,这一时期至少还有与他在后来一起倡立南社、“以文学来鼓吹民族革命”的陈去病,以及高旭的叔叔高燮、弟弟高增等人,他们在一些报章上共同撰稿,相互激荡,使得“男降女不降”之声一时高唱入云^[10]¹⁵³。在“男降女不降”言说潮流的加持下,“女中华”得到《女子世界》杂志的青睐自是顺理成章。

(四)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知识界盛行一时的“男降女不降”的言说潮流,与“女中华”喻示的“尊女抑男”的价值判断彼此呼应,并非此说获得《女子世界》注目的最关键之处。“女中华”话语在生成之初,那位男性启蒙者虽想象性地将女性置于主体地位,甚至不惜给予“女尊男卑”的崭新表述,但女性主体地位的获得,势必要以服膺于“新造中华”这一政治任务为前提。换句话说,“女中华”这一构词方式的关键在于“中华”而非“女”。对于女性而言,如何努力获得“新造中华”的历史资格,才是彼时知识界真正的关心所在。清末众人之所以反复书写、言说“男降女不降”,其真正意图也早已被时人道出:“抑唯男子之不足道,吾又不得不深万一之希望于女子……吾又遍搜稗官小说,以及遗闻口述之流,见有所谓‘男降女不降’之说,吾未尝不奉之以为中国女界之魂,而决民族思想必起点于是也。”^[16]在柳亚子的这段言说中,“男降女不降”有着“中国女界之魂”和“民族思想起点”的双重寓指,而将“中国女界之魂”置于“民族思想起点”之前,正是欲强调在男子不足道的情况下,女界拯救民族国家的急迫历史任务和可能性^[17]。由此可见,无论是“女中华”话语的提出还是“男降女不降”的历史追忆,背后皆存在一个救亡图存的现实主义动机,此乃本话语获得《女子世界》青睐的最大因由。

“女中华”之说既与《女子世界》杂志存在如此深厚的关联,若要考察其在晚清中国的传播流布,《女

子世界》自是不可绕过的重要文本。这不仅因为本杂志的灵魂人物——金天翮是此话语的反复陈说者,而且以“女中华”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在本杂志举办,藉由此形成的一批关键的文本材料亦多刊载于此。考虑到杂志这一大众传媒本身拥有的传播效力,且《女子世界》为清末近三十种女报中历时最久、册数最多、内容最丰者^{[10]85},理应将传播“女中华”话语的“身先士卒”之功归于《女子世界》杂志。

三、集体狂欢:“女中华”的文学聚焦及其女性想象

以“女中华”为主题的征文,集中刊登于1904年《女子世界》杂志的第4期、第5期,作品虽然不多,仅《女子世界颂词》《女中华歌》《女中华传奇》《女中华》四篇,但却包容诗歌、戏剧、论说文等诸多体裁,从文学想象这一层面赋予“女中华”以变动不居的新意。通过对这一系列征文的梳理与呈现,我们也能从中探析晚清知识人“想象”女性的一点方法。

(一)“女军人”“女游侠”和“女文学士”

《女子世界颂词》登载于1904年《女子世界》第1期的“社说”栏目,作者署名“初我”,即杂志的主办人之一丁初我。依据“首期初我当社”的说明,可知《颂词》一文实属于“女中华”的命题作文系列,因此在考察“女中华”的文学聚焦这一问题时,理应将其列入。文章起首便直入主题,赞美即将来临的、纷繁多样的“女子世界”:
“壮健哉!二十世纪之军人世界。沉勇哉!二十世纪之游侠世界。美丽哉!二十世纪之文学美术世界。吾爱今世界,吾尤爱尤惜今二十世纪如花似锦之女子世界。”^[11]随后作者笔锋一转,变理想为现实,目及彼时浊世,以“国民者,国家之分子;女子者,国民之公母也”这一多为晚清有识之士所承认的公理,推演出两种可能导致中国衰亡的原因:一为“吾谓三千年之中国,直亡于女子之一身”;二为“非亡于女子之一身,直亡于男子残贼女子而自招其亡之一手”^[11]。无论从正面抑或反面立论,意思皆在强调女子之于国家命运的极端重要性。正因为女性对于国家命运握有生杀大权,所以改造女子成为再造中国迫不及待的任务:“欲再造吾中国,必自改造新世界始;改造新世界,必自改造女子新世界始……女子世界出现,而吾四万万国魂乃有昭苏之一日。”^[11]那么应该如何改造“女子”?论者进而提出“去旧质、铸新魂”的三法:“军人之体格实救疗脆弱病之方针,游侠之意气实施治怙怯病之良药,文学美术之发育实开通暗昧病不二之治法。”^[11]上述三法,若用现代教育学的专业名词来进行表述,意思更为显豁,即体育、德育和智育。文章末尾,面对“亡国燃眉,灭种临睫,不救须臾,生气灭绝”的急迫局势,丁氏一腔爱国热情喷涌而出,以上述三法分别灌注于三类女性人物之身,终将心目中的“女中华”角色和盘托出:“呜呼!吾最亲爱最密切之二万万女同胞,其共养成女军人、女游侠、女文学士,以一息争存于二十纪中。”^[11]“女军人”“女游侠”“女文学士”在此不仅成为“女中华”指涉的具体对象,更因其中包含着“救国”这一宏大的政治题旨而为男性启蒙者所呼唤。

(二)义烈的“明季女子”及其精神传人

《女中华歌》出现在1904年《女子世界》杂志第4期,作者署名“吹万”,即经常为杂志提供诗歌稿件的高燮。诗歌洋洋四五百字,且多出七言,前半篇追述明季历史,以“男降女不降”为线索:“人生不幸有如此,汉水无波自由死。腥秽熏天二百年,神州不见一男子……七尺堂堂皆鼠伏,猓尾低垂辱莫辱……野蛮宰割共牵连,何以男降女否世争传?吾意女界当时必发达,力能撑持群已排彘腥。团体坚强谁敢御,贵胄那分男与女?”^[18]作者分明以明季女子抗争异族为荣,而以男子投降异族为耻,甚至猜测一个发达的女界曾出现于明季。诗中虽未标举明季女子的实际作为,但与怯弱可鄙的同代男子相参照,她们已然是高燮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女中华”。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前半部虽着眼于明季历史,但细读之下却又无不几分感怀现世的味道:“妇人从古系兴亡,岂独匹夫责有与……呜呼!汉儿汉儿大可鄙,豢养恩深便欢喜。奴颜婢膝可怜虫,也应愧杀裙钗底。”^[18]既然妇人自古以来便与“国家之兴亡”息息相关,那么由此联想至晚清现实,如今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女性自然不应袖手旁观,这正是诗作者未及明言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这一“期望晚清女性效法明季先贤，为‘救国’贡献力量”的深切用意，虽然潜隐于文本底层，但是对于身处晚清时代的读者而言，自能心领神会，而接引明季“男降女不降”的历史来照应晚清现实，对于其时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而言，无疑更具感召力。

诗歌的中部，作者的叙述视角径直由历史转向现实：“迩来欧潮美雨更逼人，惯以间接虐我民。哀哉大仇天难共，嗟尔强敌太不仁。教育顽陋民气劣，帝国主义号特别……方针一转为媚外，现诸丑态向人夸。民族腾笑全地球，吾羞言之浹背汗。”^[18]以写实之笔触，通过对晚清社会情状的描摹，表达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清廷腐败统治的愤恨不平，拳拳爱国之情彰彰在目。诗歌的末尾，作者一方面延续“男降女否”的诗思，另一方面则将救国之希望寄托于同时代女子，对女界光明灿烂的前途充满信心：“胭脂染为历史光，自此须眉不名誉。方今二十世纪女同胞，热心救国宗旨高。女学既兴女权盛，雌风吹动革命潮。吾华男子太无状，献谀屈膝穷俯仰。多少兰闺姊妹花，相将携手舞台上。”^[18]这一女性将在20世纪的舞台上担当主角的构想，承接丁初我、金天翮的思绪，与二人先期发布的《女子世界颂词》《〈女子世界〉发刊词》等文章中的主旨思想一脉相通，而“女中华”的指涉范围，在此除了诗歌前部歌颂的历史上的义烈“明季女子”外，更应包括她们的“精神传人”——以“热心救国”为宗旨的20世纪女同胞。

（三）多维度的“女子革命军”

从《女子世界》杂志第5期开始，更为精彩的“女中华”主题征文开始出现。松江女士莫虎飞撰写的《女中华》论说文，被本志的编辑同人评选为“征文甲等之二”，可见文章之亮眼。作品的开篇即响应经丁、金二人反复论证的观点，将女子奉为中华乃至世界的主角：“今日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也；今日之中华，女子之中华也。”^[19]作出如此论断的原因，在于“盖二十世纪之中华，有一轰天烈地之怪物焉。斯物既出，而我中华之二万万同胞姊妹，遂跃出苦海，共登灿烂华严之世界。斯物也？何物乎？即女子之革命军也”^[19]。“女子革命军”成为作者论说“女中华”的关键所在。不过，所谓的“女子革命军”，虽与作者在文末期盼的“一月三捷，杀尽胡儿”的“美人军”相匹配，但又并非简单如字面意义所言，实际上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引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典故，莫虎飞认为“齐家”乃女子的责任，如果每位女子全懂这一责任，那么国家必定富强，而“欲女子知齐家，必先兴女学”^[19]，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兴女学”，论者以“兴女学”替换《礼记·大学》中的“修身”，赋予这一传统古训以十足的现代色彩，女学之重要性由此凸显出来：“女学者，立国之根本，女国民之责任也。同胞姊妹，盍亦留意于此乎。”^[19]既然“女学”足可成为立国之根本，那么“则他日以纤纤之手，整顿中华者，舍放足读书之女士，其谁与归”^[19]。“放足读书”之女士，恰为作者心目中“再造中华”的最佳人选，文章开头立论的“女子革命军”，在此维度上理解才更加全面。

（四）英雌女杰——“黄英雌”

被《女子世界》杂志推举为“征文甲等之一”的《女中华传奇》，刊登于本志第5期的“小说”栏目，作者是高增，发表时署名“大雄”。根据作品的实际内容来看，这篇《女中华传奇》并非一篇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出戏剧的脚本——且为女主角“黄英雌”的独角戏。剧本中的“黄英雌”为一“辫发西装、脚踏皮靴”的新式女郎，开场吟咏四句铿锵有力的诗：“忍令江山踞虎狼，裙钗队里暗无光。从今磨洗刀和剑，大唱‘男降女不降’”，^[20]为之后的“高谈阔论”先行预热。到了演说环节，这位女杰先是自述生平，谈及自己从小接受家庭教育，沐浴在自由的氛围中，是男女平权的积极提倡者，之后一改平和语气，转向控诉中国几千年来的缠足陋习、以及“三从七出”“男尊女卑”等封建旧观念，视它们为导致现今“种族衰微，宗邦沦陷，变成个病夫国”的原凶。但这位女杰，并未因此失去信心，而又畅言：“中流砥柱，端推巾帼英豪……荆榛斩尽开雄抱，鞑靼推翻赖女曹，旧河山，从新造。”^[20]希望以己之身担负起重整山河的任务，一腔爱国豪情呼之欲出。可是返观现实，黄英雌又难免失望，因为她看到“我姊妹们却是一枕黄粱，悠然方熟……只知道装个花容月貌，更还要金莲三寸……深居楼阁，花月无聊，吟春咏月，芳魂黯销”，

愤怒之下竟然“哭神州俺索性洗涤文明脑”^[20]。冷静下来后,这位女杰觉得与其对别人求全责备,不如好好要求自己,“自己先改良人格,恢复自由,使东西洋文明国人,不敢轻看我,称俺做女中华,女豪杰”^[20]。尾声部分,亦由黄英雌所唱,情调重回激昂,与开场所吟之诗彼此应和,足以振奋人心:“磨刀须把奇雠报,活婊娟、激起神州革命潮,看他年铜像儿巍巍云表。”^[20]《女中华传奇》虽以黄英雌的自言自语为主要内容,但根据作品构设的语境,显然有假想的观众群体存在,形成一种虚拟的“演说”氛围,而且这位女英雌言谈通俗,字字恳切,自会感染人心,收启蒙大众之功效。或许,此乃这篇作品当选“女中华”主题征文第一名的主要原因,作者精心构造的“黄英雌”这一女性人物形象,也明显是其心中“女中华”的突出代表。

总而言之,无论“女中华”话语的具体所指有何差异,但其包含的两层意义基本为晚清知识界所公认:一是女性担当中华的主角;二是女性以“再造中华”为首要任务。正是这一全新的女性社会性别角色,使得心存救亡图存之志的晚清知识分子着迷不已,恰逢《女子世界》杂志举办“女中华”主题征文活动,使得他们可以发挥无穷想象力,纵情描摹各自心目中的“女中华”形象,一场乌托邦式的集体狂欢由此开启。从丁初我呼唤的“女军人”“女游侠”和“女文学士”,到高燮追忆的义烈“明季女子”,从松江女士莫虎飞期许的“女子革命军”,到高增集中塑造的“黄英雌”这一英雌女杰形象,她们构成了“女中华”话语所能指涉的最为丰富的人物面向,组成了晚清女性人物形象的大谱系。晚清知识分子对于女性的想象与再构,于以“女中华”为主题的文学书写中体现得分外明显。

四、结 语

作为一种独具时代特色的社会性别符号,“女中华”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产生于晚清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借助“男降女不降”此一历史记忆的回魂言说,以及西方女权思想的映照传播,而为晚清知识人所建构。从原文语境中的“具备新造中华资格的女性”,到启蒙者金天翮集中阐述的接受新式教育的现代女学生,再到“女中华”主题征文所书写的一系列更加复杂多变的女性角色,“女中华”话语在实际建构过程中呈现出差异性、随意性、多面性的特点,也正是凭借启蒙者言说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微妙差异,独具意义的张力空间得以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女中华”的话语建构过程,也是晚清知识分子持续地对女性展开想象与再构的过程,而女性想象的最终结果,又进一步落实到“再造中华”这一问题,即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其间存在着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比如,作为启蒙者的金天翮在引述“女中华”一说时,以接受新式教育为女性获取“新造中华”的资格——最终落脚点仍在于中华,而非单纯为了女性自身的发展。再比如,那些体裁各异的主题征文虽然以文学特有的方式书写、想象了一系列“女中华”角色,但是无论这些角色如何多样,在她们的身上皆贯穿“创造新中华”这样一条主线,其中体现出作者以女性挽救(重整)民族国家的共同期待。学者李奇志将“女中华”归入更加宽泛的“英雌”话语谱系,进而认定这一谱系的出现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社会总动员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艰难复兴过程中的性别反映和表现^{[21]366},正是洞察了以“女中华”为代表的晚清英雌话语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存在的深刻关联。

尽管“女中华”话语日后并未流行太久,却无碍于其作为历史遗留物的价值存在。它的出现,不仅昭示出晚清“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界对于女性的热情关注与想望这一独特文化现象,而且其中凸显的将女性纳入到民族国家整体框架内的思路,甚至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22]38}。有学者曾经提出,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西方女性主义资源的简单横向移植上,而应该落实在对本土资源批判性的反省与汲取上^[23]。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本土资源的晚清“女中华”话语,它的出现与建构,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关于女性的想象,应该会给予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某种启示。

[参 考 文 献]

- [1] 乔以钢,刘堃.晚清“女国民”话语及其女性想像[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 [2] 刘堃.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 [3] 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 [4] 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J].女子世界,1904(1).
- [5] 佚名.文学小史·志女中华[N].选报,1902-10.
- [6] 金天翮.女界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7]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9] 佚名.女学悬赏征文[J].女子世界,1904(1).
- [10]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11] 金一.女学生入学歌[J].女子世界,1904(1).
- [12] 初我.女子世界颂词[J].女子世界,1904(1).
- [13] 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4] 海上漱石生.退醒庐笔记[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 [15] 亚卢.女雄谈屑[J].女子世界,1904(9).
- [16] 松陵女子潘小璜.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J].女子世界,1904(7).
- [17] 雷霖.“男降女不降”:晚清女性——国族话语与战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中国文学研究,2013(2).
- [18] 吹万.女中华歌[J].女子世界,1904(4).
- [19] 松江女士莫虎飞.女中华[J].女子世界,1904(5).
- [20] 大雄.女中华传奇[J].女子世界,1904(5).
- [21] 李奇志.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中的“英雌”话语[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 [22] 刘慧英.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23] 董丽敏.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The Discourse of “Female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Female Imagination

Ma Long

(School of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assionate concern and desire for women constituted a striking 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 among which the proposition of “female Chinese” put forward by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was of typical significance. The claim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 report in Shanghai’s *Selected Newspaper*, and gained attention after he was quoted in a book called *Women’s World Bell* by Kim Tianhe and a themed essay contest held by *Women’s World* magazine. Because of the openness of the discourse form itself, there are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positor’s speech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thus forming a unique tension spa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unique social gender symbol of “female China”, combs the specific process from its emergence to its dissemination, discusses how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participated in the imag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women, and reveals its profou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 state.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female Chinese; *Woman’s World*; female imagin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 state

[责任编辑:陈忻]